



《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述评

李吉和

西夏是古代党项羌人以银川为中心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之一。党项本为一小部族，几经迁徙于唐末在陕北一带建立了割据政权。其统治者乘中原动乱之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实力，经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的经营，势力发展迅速，东抗辽、宋，西攻回鹘和吐蕃，将势力推进到河西走廊，控制了“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1038年，西夏王元昊在经过改姓建制、创立文字、秃发易服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正式建立大夏国，都兴庆府（今银川市）。统治区域相当广大，奄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先后与北宋、辽和南宋、金等政权鼎足而立，最后于1227年亡于新崛起的蒙古汗国。西夏灭亡后，境内民众四散，除居留故地者外，其余散居于各地，从漠北到西域，从青藏高原到中原腹地，都有西夏遗民入，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就是其中的一支。^①

元人从大一统的史观出发纂修辽、宋、金三史，将三个朝代置于平等的地位，这是颇具历史眼光的。但独不为西夏写出一部分量同样足观的纪传体专史，只在三史的外国传中以少许篇幅专载西夏史事：116卷的《辽史》只有《西夏外记》一卷，135卷的《金史》仅有《西夏传》一卷，《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全书达496卷，其《夏国传》也只有上、下两卷。以此之故，西夏史料很快湮灭亡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至于清人吴广成撰《西夏书事》、张鉴撰《西夏纪事本末》、周春撰《西夏书》及民国戴锡章撰《西夏纪》等，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能作为史料来使用的。所以，发掘、研究各种新涌现出来的史料，成为西夏及其遗民研究中至为关键的工作。1985年河南濮阳发现的《述善集》手抄本，就是新发现的研究元代西夏遗民历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述善集》系濮阳西夏遗民唐兀氏（杨氏）四祖崇喜于元末至正十八年（1358）编成的一部未刊著作集。从集中看，唐兀崇喜（1300~1372?）为元末儒士，为逃避元末红巾军起义曾避居京师十年，与在京名士潘迪、张以宁等过从甚密。在农民起义失败后，崇喜又返回濮阳，决心振兴乡风，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兴建孔庙，订立《龙祠乡约》，创办崇义书院等，名声大振。因此四方文人墨客路过濮阳，往往有诗词曲赋相赠，多是对唐兀氏家族先祖业绩的褒扬。崇喜将其汇编成册，命名

^① 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第53~79页（收入《述善集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6~295页）；孟楠：《元代西夏遗民的迁徙及其与其他民族融合》，《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31~38页。

为《述善集》。现存抄本 2 件，保存完好，全书共分《善俗》、《育材》和《行实》3 卷，内收记、序、碑铭、诗赋、题赞、杂著等共 75 篇，保存了极为丰富、异常珍贵的元代濮阳西夏遗民资料。此书由杨氏(唐兀氏)家族作为祖上遗训一代一代传抄，从未刊印，也从不轻易示人，故 600 年来，得阅此书者甚稀。

有幸的是，这一弥足珍贵的著作在近期由焦进文先生和杨富学博士合力整理出版了，那就是甘肃人民出版社于 2001 年 11 月正式推出的《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一书。

《述善集》因为仅有手抄本传世，经过反复的传抄，鲁鱼亥豕之处时有所见，甚至出现多处空白，加上书中用典繁多，古代民族名目复杂，涉及地域广博，若不予以系统的整理与校注，阅读时必会遇到相当多的障碍。焦进文和杨富学积多年之力，合作对其进行了标点、注释，自然会帮助读者解决阅读时的困难。诚如学界所评论的那样，该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元明史、少数民族史、民俗学，尤其是元代西夏遗民历史文化的研究。^①

焦进文先生长期在河南省濮阳县担任文化、宣传领导工作，与杨氏家族关系密切，比较了解濮阳地方掌故与风土人情。杨富学博士就职于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是北方民族史研究的专家，著述甚丰，先后出版有《沙州回鹘及其文献》(与牛汝极合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2003 年再版)、《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年)、《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与李吉和合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 年)、《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与邓浩合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年，2002 年再版)、《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和《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等多种专著。二人合作，可发挥各自的优势，实乃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不仅对抄本进行了整理、标点，而且查阅了大量古代史书和与之相关的地方志书，对文献进行了精心的校勘，对其中的典故、名物、人事、典章制度都进行了详尽的注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注释并不局限对一事一物的简单说明，而是不囿成说，经过认真的研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推陈出新。如第 2 页对贺兰山名称的解释：

贺兰山的得名，一般认为因“山有树木青马，望如駮马，北人呼駮为贺兰”。笔者颇疑此说。窃以为“贺兰”者，应为突厥、蒙古诸族常用以命名山水的“喀喇 kara”一词的音转，意为“伟大、高、雄伟”。

言虽不多，却切中肯綮。如所周知，关于贺兰山的得名，学界关注者不少，但一直人言言殊，未能达成共识。在这里，杨富学先生以其语言学上优势(精通古突厥—回鹘语文)，提出全新的解释，虽限于体例未能全面展开论述，但已经足以使我们大开眼界。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有喜以“喀喇 kara”来命名地名的习惯，其例不胜枚举，而所谓的“合黎山”、“黑龙江”，根据杨富学先生的考证，其实也就是“喀喇山”、“喀喇江”的音转。^② 观点新奇而又极具说服力。鄙以为这个解释是完全可以信从的。

^① 朱绍侯：《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序》；[日]船田善之《新出史料〈述善集〉介绍——新刊の关联书三册》，《史滴》第 24 号，2002 年，第 141~150 页。

^② 牛汝辰：《新疆地名中的“喀拉”一词辨析》，《新疆社会科学》1984 年第 4 期，第 144~146 页；杨富学：《“黑龙江”名出阿尔泰语考》，《语言与翻译》2000 年第 3 期，第 52~54 页(收入杨富学《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3~37 页)。

《校注》作者善于运用《述善集》中的新资料以解决史书记载中存在的问题。如 231 页注释“惟事注疏”一语时，对金元经学的发展作了如下阐述：

金朝出现了一些通晓经学的学者，其中既有汉人，也有女真人及其他族人。如冯延登，长于《易》与《左传》，平生以攻研《易》为业，并集前人章句，名为《学易记》；董文甫对《论语》、《孟子》诸书一章一句都熟读深思。据杨家骆《新补金史艺文志》著录，金人注疏、解说《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著述达五六十种。只是这些著作对经书的注解，惟以注疏为事，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做法迥然有别。朱熹校注《四书》的特点，“在于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字一句之间也”。即是以程朱理学的特有概念和观点结合经文的义理，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原书的思想体系，而不斤斤于字义、名物、制度的孤立烦琐的考证。蒙古灭金后，承袭了金朝经学“惟事注疏”的传统。

不仅解释了“惟事注疏”一语的基本含义，而且精辟地剖析了金朝经学发展的时代特色，指出这一特色在元初曾得到沿袭。再如第 51 页对《述善集》中出现的元代官职“弹压”的解释也是颇可信从的：

弹压：官名。元朝千户所官员，二员，蒙古（或色目）、汉人参用。按《元史·兵志》载，弹压一职始设于忽必烈至元年间（1264~1294）。而唐兀台卒于公元 1258 年，说明在世祖以前，该职即已存在。此载可纠正《元史》之误。

“弹压”一词出现于唐兀崇喜撰《自序》一文中。文称：“先祖唐兀台，国初从军有功，选为弹压。岁乙未（1235），扈从皇嗣兄弟南征……”从行文看，“弹压”一官的设置，似乎应在 1235 年以前。

《校注》出注近千条，旁征博引，广泛吸纳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如第 165 页对“慎独”一词的解释，千百年来，人们都广泛接受郑玄所谓“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①的说法，但 20 世纪 70 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和 90 年代出土的郭店竹简所见的“慎独”，内容却与郑玄之说迥异。^②《校注》采用了当前学界研究这些文献的最新成果，故能推陈出新，获得正解。

再如 171 页对“老子”一词的注释有以下话头：

《老子》一书是否为老子所作，历来有争论。直到近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发现，才进一步证实：孔子问礼之老子，确系《老子》一书的始初作者；而《老子》一书，也确系始成于春秋时代，尽管它此后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演变过程。与竹简《老子》甲、乙、丙书同时出土的另一竹简文本《太一生水》，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宇宙生成学说的著作，很可能同出老子之手。

这种解释对读者来说就不无启发性。同时，《校注》中还大量使用了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如《孝子传》、《古贤集》、《目连缘起》、《舜子变》以及《道德经》等，以证史补史，极大地便利了读者对当前学术研究动态的掌握。故而该书出版伊始，即受到学界的关注，盖有以也。

《校注》补缺溥漏之功也是值得称赞的。如第 90 页根据王安石《寄赠胡先生》诗“先收先生做梁柱，以次构架栊与榱”之语而补出了孙子初诗中原缺的“榱”字，很有见地。

为便于读者认识《龙祠乡社义约》（《述善集》卷 1）在中国伦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校注》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吕氏乡约》、《乡仪》、《增损吕氏乡约》、《南赣乡约》和瑶族的乡约作为附录 1 收入书中，以资比较；为便于了解濮阳西夏遗民后裔的历史情况，附录 2 收录了不少家谱资料。同时，书后还附有《西

① 郑玄注《中庸》。

② 梁涛：《郭店竹简与“君子慎独”》，《光明日报》2000 年 9 月 15 日第 4 版。

夏与濮阳西夏遗民大事年表》、《主要参考文献》和《注释条目索引》，这些也都是极具匠心的。

《述善集》一书原有文字不到 4 万言，但《校注》却洋洋 30 余万言，篇幅增加了数倍。前贤有云，为一书作注释，既要为原著的忠臣，又要为原作的诤友，《校注》一书可谓兼而有之，功莫大焉。

总之，《校注》是一本研究元代西夏遗民历史文化发展的案头必备的好书。她的问世，必将推进元代西夏遗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作者通信地址：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3)